

在中国制造

〔挪威〕玛黑特·里 瑞格荷德·路德 歌德·霍普斯登·汉森 主编

朱善杰等 译 闵冬潮 校

Making it in China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中国制造

〔挪威〕玛黑特·里 瑞格荷德·路德 歌德·霍普斯登·汉森 主编

朱善杰等 译 闵冬潮 校

Making it in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中国制造/(挪)里,(挪)路德,(挪)汉森主编;
朱善杰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书名原文:Making it in China

ISBN 978-7-208-11253-7

I. ①在… II. ①里… ②路… ③汉… ④朱…

III. ①企业文化-对比研究-中国、挪威 IV. ①F279.23
②F279.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1332 号

Making it in China © Høyskoleforlaget 2008

© 2013 by Shanghai Century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mpany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出品人 邵敏

责任编辑 张玉贞

装帧设计 张志全

在中国制造

[挪]玛黑特·里 瑞格荷德·路德

歌德·霍普斯登·汉森 主编

朱善杰等 译 闵冬潮 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北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150 千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1253-7/C·435

定价 28.00 元

目 录

导言 1

第一部分 大图景 13

第一章 中国从量到质的经济增长：周敦仁教授访谈 / 15

歌德·霍普斯登·汉森 亨宁·库瑞斯特弗森

[附]访谈 采访者：西杰·瑞斯莫 被访者：朱峰

第二章 北欧文化和北欧人：一个中国的视角 / 26

房晓辉

第二部分 全球交汇点的工作和价值 47

第三章 全球企业和本土工人相遇在中国 / 49

玛黑特·里 瑞格荷德·路德

第四章 上海“白领丽人”：职场全球化趋势下的中国都市女性身份 / 70

孙中欣

[附]访谈 采访者：西杰·瑞斯莫 被访者：梁敏 / 88

第五章 中国青年：“邓一代”青年专业人士的价值观和策略 / 90

亨宁·克里斯托弗森

第六章 当代中国妇女的劳动力流动和移民生活 / 106

丽斯贝特·索尔莉亚 王菊芬

第三部分 国内的外来者——挪威商业在中国 125

第七章 中国和“海德鲁方式”：访谈海德鲁铝业高级工程师
卡尔·列文 / 127

歌德·霍普斯登·汉森 汉斯·乔根·洛芬

第八章 是卡拉 ok 还是腐败——平衡跨国公司里不同的期
望与要求 / 140

歌德·霍普斯登·汉森

[附]访谈 采访者：西杰·瑞斯莫 被访者：李欣

第九章 激励员工留下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北欧公
司研究 / 160

思赛尔·汉姆斯卓莫 瑞德·鲁纳

导 言

(玛黑特·里)Merete Lie,

(瑞格荷德·路德)Ragnhild Lund

本书是一项合作项目成果,研究关于急速涌入中国的外国公司。这项研究由挪威的研究者发起,并与中国研究者共同合作完成。除了展示我们自身的研究成果,我们还邀请了有关方面的作者以便扩展本书的范围。因此,读者可以发现来自不同作者的不同方面的观点,既有中国的,又有挪威的。作者们在跨文化和发展这两个交叉点上来讲述故事,跨文化的维度是关于中国人与挪威人相遇时不同的情景连接,以及他们是如何互相理解和交流的;而发展的轴线则涉及这些方面:中国的社会和人民在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变化,以及目前这些变化如何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

在访问中国时,我们不断地搜寻关于当代中国的英文书籍。在关于外国工业投资的书架上充斥着“如何成功”的文字。尽管我们的书名也可作这种解释,但本书的目的与此完全不同。这本书里提出了一种现象——当地的民众与全球化的公司的汇合点(meeting point)如何蕴含着对双方的改变。一些作者关注中国的发展,另一些则关注中国人民生活的变化,还有一些作者聚焦于外国公司。当然,所有的作者都在关注本土与全球的连接,诸如:中国如何适应全球经济和外国企业的影响?外国的公司又如何适应当地的状况?外国公司和中国的雇员又是如何相互适应的?

一个外国人可能在来华之前已经受到他所在的国家对中国形象塑

造的影响。这种相遇从不会是全新的,而会受到其预期的影响。每代人对中国的想象都不同,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属于这一代,中国被看做是在地球另一边的童话式的国家,当然也是与我们自身最不相同的国度;这是个有着皇帝、丝绸之路、具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的中国。年轻一代中的一部分主要从共产主义的角度来理解中国,中国变成了另外一个图像,成千上万人都穿着蓝色或绿色的服装。更年轻一代对中国的印象主要是中国的沿海城市闪烁着港台风的影像和媒体流行音乐。由此可见,我们谈论的无疑是一个正在飞速变化的国家。这些变化的过程多少是由与其他国家增长着的区别所引发。中国不仅仅是被动地“打开门户”,而是已经变成了正在进行的劳动力全球分派的主要获利者。在此,我们将简要地介绍这本书中一些作者对变化着的中国的描述。

变化中的中国

中国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不能被高估,它强制着每个人不断增进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大量涌入全球的中国消费产品和其导致的西方民众不断增长的购买力,足以为证。全球化的发展经常被看做是中国工业发展和政策变化的推动力,当这一力量与国家的政策和优先发展结合在一起时,就开拓了当下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的劳动力分布正在迅速变化,它开始于简单组装工作的转移。很快,高级技术的生产在中国的独资和外资企业出现了。而诸如计算机服务和工程技术等具有资质的外包工作则是另一走向。甚至像在地球另一端的小国挪威,也通过商业、工业和学术的合作与中国结成了紧密的联系。

与全球化变化的连接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然而,这一过程在中国是以加倍的速度发展的。全球商业和文化连接的历史在上海这一大都市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半世纪以来,这一城市已经成为工商业的中心,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大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沿着黄浦江,自上

世纪初建造的西方的大型商业建筑为游人们所赞叹。过去的租借地在城市设计中仍居于显著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依旧反射出这一城市中的贫穷与富裕的区域,同时,上海正以惊人的速度变化着。其市容的典型照片是惊人的新老合璧。摩天大楼经常屹立在老建筑之后,这些建筑多是未来派设计的高楼。江里的船只则是从最古老的到最现代的应有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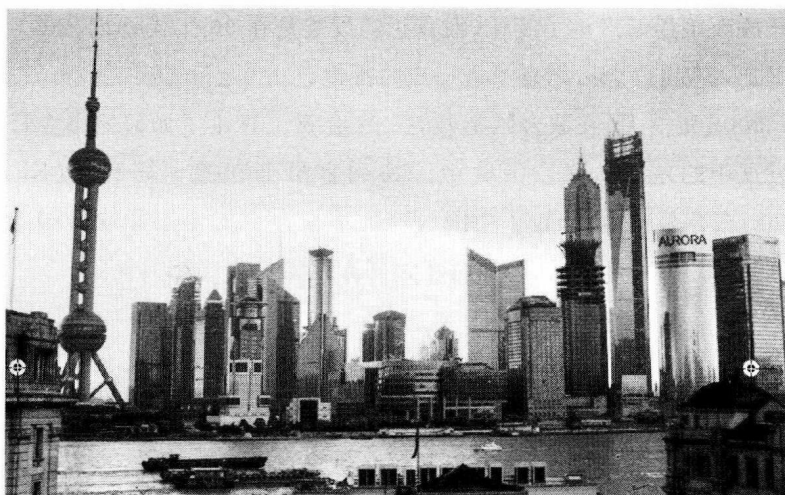
中国在所有方面的变动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人走出国门进行交流和学习,同时,外国人不断涌进(主要是经商),还有一大部分人口从农村移民到城市。自1949年以来,在长期的关闭门户之后,1978年实行的开放政策逐渐产生了变化,而真正的发展是在90年代初期,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则有了进一步的推进。

2006年9月,在联合国举办的一次会议上讨论了如何缩小今日中国发展中的差距。联合国驻中国协调官员卡利德·马利克(Khalid Malik)在开幕词中,比较了中国政府的小康社会的愿景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他认为在两者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

中国的小康社会的愿景在几个方面超越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国在很短的时期内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经济发展中第一类挑战——消除了饥饿、流离失所和公然的剥夺——现在,中国面对着校正正在经济迅速增长中失调这一新的挑战。缩小内部发展中的差距的需要是中国下一步发展的确定目标,如果要实现2020年小康社会的愿景,这一步必须要成功。(Malik, 2006:1)

根据马利克的讲话,以“发展与公平”为题的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已经确认和分析了这些发展的挑战和差距。有意思的是,引起这些不平衡的根源经常与为快速发展奠定基础的同样积极的发展有直接联系。这一矛盾现象的两个例子引起了关注:劳动力流动增长与中国的流动人口的影响。

经济改革之后,农村里失业的劳动力人数已经快速增长了,最近的统计表明大约有 2.5 亿人(Lu, 2004:4)。上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敲响了移民“流动”的警钟。今天,移民被视为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重要因素,而新的政策是农村的工业化(Han, 2004)。中国劳动力不断增长的流动性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强劲表现的中心因素。近来的一个统计数据表明,由流动的工人所创造的平均附加值是他们在原住地所创造的价值 的 4 倍。同时,移民们也对移入的城市为他们及家庭所提供的基本社会服务提出了挑战。



上海天际线

人口流动的结果使中国农村人口发生着急速的变化。例如,由于年轻人离开了农村,中国农村正在出现老龄化问题。农村人口中老龄化的比例明显高于城市地区并且正在迅速增长。对稳定的农村社会保障的要求也在增长,而能够对此作出资金贡献的农村劳动力却在减少。在年轻一代已经获得了工作和服务的机会时,目前这一代工人也接近了退休的年龄,未来福利政策的真正成功对社会保障系统提出了挑战。最近,面对不断增长的老龄化人口,对通过修正独生子女政策来支持福

利制度的争论已经出现。

解决方案成为新的问题

为解决贫困和人口过多的第一是决策的结果现在已经变成了问题而需要解决。一个总目标是增加收入和福利。然而,在中国快速发展的部分增长的收入已经引起了相对的贫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与低层教育的人之间、在新兴工业与在初级工业(矿业)和停止衰竭的国有企业工作的人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在不断拉大。政府已经执行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但发展的势头不是拉平收入和福利上的差距,而是在不断加强这些差距。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医疗保障和教育等社会服务处于很差的状况。

另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是污染。工业部分的迅速扩展伴随着由此而来的能源消费的增长,巨大规模的垃圾已经成为严重问题。再加之迅速发展企业和家用汽车、空调系统、冰箱等等,都加剧了污染。此时,这些作为工商业新兴市场成功的先兆,同时也产生了最为紧迫的问题。

人口中很少一部分在外企工作的人成为“幸运抽奖”中的赢家。他们的收入不但高于在其他工业部门工作的人,也高于那些处于贫困状态的为外国厂家供货的工人。但总的看来,中国人口中的大多数对正在进行中的发展表示满意,因为这意味着收入增加的可能性。然而,即使那些幸运的人也正在付出很高的代价。今日中国的城市生活紧张而又有压力,交通恐怖,污染严重。人们工作劳累超时,在交通拥堵中奔波于家庭与工作单位之间。由于缺少现代家用器具,家务劳动耗时费力。甚至在城市,有些家庭仍使用煤炉做饭。即使是对于那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广大人口来说,城市生活仍然是传统的家庭方式。新的生活方式已鲜活地显露于中国的小说之中,从下面池莉的小说《烦恼人生》中的描写可见一斑:

八点上班,印家厚必须赶上六点五十分的那班轮渡才不会迟到。而坐轮渡之前还要乘四站公共汽车,上车之前下车之后还各有十分钟的路程。万一车不顺利呢?万一车顺利人却挤不上呢?不带儿子当然就不存在挤不上车的问题,可今天轮到他带儿子。印家厚打了一个短短的呵欠后,一边飞快地穿衣服一边用脚摇动儿子。“雷雷!雷雷!快起床!”

通往现代化的另一条道路

尽管中国发展的速度与规模都是惊人的,但大致来说也只是另一种现代化的过程。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步西方之后尘,并且变得与之更相似?社会人类学家黄爱华(Aihwa Ong, 1996)提出,我们应该提出不同的现代性,来考虑中国道路的明显不同。一般而言,研究世界往往通过西方之眼,这恰恰也阻碍了差异的视线。首先,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不同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不再是纯粹社会主义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它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邓小平在1992年宣布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或许可以解读为由在沿海地区建立“几个香港”来现实(Ong, 1996:66)。最显著的区别是,尽管这仍旧是国家主导的经济,但是不同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可能是新的消费模式使西方的民众认为中国正在步现代化模式的后尘。从表面上看,时尚和新的消费品表面看起来越来越相似,但正如几位作者所阐释的,中国悠久的历史 and 不同的哲学传统仍旧在中国走向未来的道路上起着中心的引领作用。

是否存在着北欧模式?

聚焦于进入中国的北欧企业,作者们展示了在北欧和中国之间在理解和实践上有价值的比较。在与其他国家的企业比较时,人们经常提到“北欧模式”,近来,这一模式已经引起了新的关注。这一概念包含着北欧社会的诸多方面:具有规模巨大的社会保障系统的福利国家;

工作中的民主；通过集中管理的与财富和收入挂钩的工资谈判和税收制度来平等分配财富的理念；关于工作与家庭关系和男女之间机会平等的国家政策。

许多人已经问到：这种模式是否可以移植到其他国家？人们很容易忘记的是，这种模式是如何逐渐发展起来的，并且是根植于其历史传统和当地的价值体系之中的，而不仅仅是政府的政策。例如，性别平等的挪威模式以其“国家女性主义”为特征，这意味着社会活动家、妇女组织和政府机构在许多方面都有同样的工作目标。同样，福利国家中不同利益，如养老金的法定资格和失业者的社会保障系统，是在劳工运动与社会民主政府合作中所发展出来的结果。于是，从底层发展出来的社会制度的利益同时也从上层得到了道义和法律的支持。社会保障制度依赖于一个道德的社会的支持并避免这些利益被滥用。过去三十年来，挪威社会与经济的变化，以及个人主义的上升和经济的迅猛发展，已经削弱了道德社会这一挪威模式建立的基础。

在工作场所，理想的模式是推进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合作，这点是通过立法使之正式化来确保在公司董事会里有雇员的代表。工会和雇主之间的合作在国家、地区及单个的公司中都有组织。这种模式在二战之后的恢复中得以发展，并且被扩展到工厂里进行试验。在生产工人的层级，他们直接参与决策，并且对雇员个人的工作环境产生更大的影响。

与其他国家相比，挪威的公司在实践中科层制层级比较少，鼓励雇员参与决策制定，并且在生产中鼓励实行团队合作，以便促进工作的灵活性。然而，随着经营的国际化，一旦公司搬到国外，可能就很难将挪威企业从其他国际公司中辨认出来。挪威公司对的工作关系的调节持积极态度，这意味着雇员和雇主之间的关系稳定，二者关系有法律保障，包括失业和医疗保险金保障。然而，从整体上看，在我们对亚洲的挪威公司的研究中发现，这些公司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与全球公司的社会相联系的国际企业来行事，而不是作为独特的北欧企业(Lie and

Lund, 1994; Lie, 1998)。

本书内容

本书主要是提出外国企业迅速流入中国的问题,并聚焦于挪威公司的经验,这一点被中国和挪威的学者及评论家共同察觉到。建立在最近的实证研究上,作者们关注中国的发展和外国的企业,以及中国民众生活的变化。如此之作是为了增强读者对“在中国制造”的复杂性、挑战和成功的理解。

本书大部分作者来自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如: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性别研究。然而,其中一些作者具有不同的中国—北欧联系的经历。卡尔·列文(Carl Lewin)(访谈)在建立合资公司的过程中具有实际的经验。周敦仁教授(访谈)在中国是国际关系和经济发展方面的专家,佟方是学者,同时跨越学院,参与实地实践工作。本书旨在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某些方面提供专业的分析,对处于这一环境中的挪威公司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并且还穿插一些与街上行人的非正式交谈中的快照和访谈。于是,各个章节对中国社会与全球化和工业发展相联系的方面提供了不同的洞见。我们希望这种方式将会吸引读者对本书进行自由的探索。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周敦仁将中国的变化和其多元文化纳入观察的视野,而佟方讨论的是不断增长的挪威人对中国的兴趣以及中国人对北欧国家的兴趣。

第一章中,周教授主要的论点是中国在应对经济的和政治的变化上持有非常小心和慎重的态度。当外国投资有利于发展进步时,在对待这些投资方面基本上仍是积极的。尽管问题与腐败、环境恶化和和管理不善的案例相联系,中国的领导层仍希望变化与改革。今天,主要的挑战是发展“和谐”,也就是弥合贫富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国内东西部之间的鸿沟。

第二章论述的是中国人对北欧的看法。佟方认为,中国近来对北欧国家产生兴趣,主要与如何将社会转变为“和谐”社会的企望有关,这种社会是建立在创新、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公正与社会和谐之上的。佟方检视了有关北欧国家的各种刻板模式,促使他来讨论中国人关于北欧的文化和人民的看法,诸如:自然、信任、诚信、平等、交易决策、沟通模式、简约、礼貌和计划。他认为,去除这些刻板模式,相互之间才可以得到更好的沟通与理解。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各章讨论的是关于在中国全球化和工业化的薄弱地方所发生的事情,聚焦于工厂的工人、妇女的身份、青年人和移民。

里(Lie)和路德(Lund)关注中国的经济结构如何影响了在工厂里工作的工人的生活。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中小企业(如大多数的挪威公司)已经成为重要的角色和获利者。主要的结论有两个方面:首先,挪威公司并没有脱颖而出,而是跟随于其他的公司之后。例如,这些公司建立在中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园区,并推行旨在吸引年轻的中学毕业生的用人政策。他们还奉行着后果是增进了社会差异的人事政策。其次,我们还发现,大家并不认为挪威公司是具有特别吸引力的工作场所,而是众多同类公司中的一种,工资不高,但工作条件比那些大型的多国公司要好。

在孙中欣撰写的第四章里,她运用在上海外国企业里工作的都市女性生育第一个孩子的经历,来探讨在华的外国公司里的女性白领的性别认同和工作经历的关系。她研究了外国公司、流行文化和女性自身的经历等因素如何混合在一起,并以此确定女性的身份。在中国,作为一名白领,要选择的不仅只是工作方式,还有女性实现梦想的过程,包括:事业有成、高收入、社会地位和较高的生活标准。这表明,与其他群体相比较,在中国城市中受过教育的年轻女性已经成为了一个享有特权的群体。

亨宁·克里斯托弗森(Henning Kristoffersen)关注中国邓小平时代

的年轻的专业人士的价值和策略。这是一个关于城市精英小众的研究,集中在复旦大学的毕业生身上。这一章描述了作为独生子女的一代的代表及受过教育的少数成功人士是如何面对未来的挑战的。他们的主要挑战与在新的市场经济和老的福利制度解体的情况下如何支撑家庭有关。

王菊芬与丽斯贝特·索尔莉亚(Lisbet Sauarlia)的研究聚焦于女性移民长期的影响,以及移民如何改变了这些妇女。她们发现,移民的主要动力是改善生活条件,通过投资于盖房、子女的教育和给农村家里寄钱。在这一过程中,子女和移民确实产生了两难的问题。家长需要外出打工,以便能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孩子的祖父母一代(通常是他们照顾孩子)不具有今天所需要的知识。尽管移民妇女对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参与世界经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她们并没有感到移民对自身的改变。即使她们已经出门在外,主要考虑的还是家里的生活。遵循着老家的道德标准,她们依旧是好女儿和贤妻良母。

本书的第三部分讲述了中国与挪威企业文化相遇的问题。对卡尔·列文(Carl Lewin)的访谈,显示出对企业文化非常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期望与要求。在回顾建立海德鲁铝业过程中所吸取的教训时,他描绘了从乐观主义到分歧和冲突的增长,他表示,在中国建立企业,文化的洞见是最重要的。

同样,歌德·霍普斯登·汉森(Gard Hopsdal Hansen)聚焦于在中国掌握挪威企业的挪威管理者如何游走于他们公司总部的期望与要求的路线上,这包括嵌入的挪威管理风格和司法权,以及对中国现实的期望与要求。该章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在中国的挪威的和其他的外国经理人对冲突的沟通与处理,这些问题包括:质量、人际关系、奖励机制、公司内部责任分布等。另外,关于中国企业环境中的腐败与伦理问题的分歧如何给在华的国际公司和其管理者带来关键的挑战。在这一环境中,管理者可能担任了“文化掮客”(cultural broker)的角色,要求他们处理双方的信息,以便保证双方可以互相理解。这种平衡的活动要

求良好的沟通、积极的表现,以及接受两种现实。

(闵冬潮 译)

参考文献

- Han, S. S. (2004). "Agricultural surplus labour transfer". In Hsieh, C.-m. and Lu, M. (Eds.), *Changing China. A geographic appraisal*. Oxford: Westview Press.
- Li, C. (2005). *Apart from lov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Lie, M. and Lund, R. (1994). *Renegotiating local values*. London: NIAS/Curzon.
- Lie, M. (1998). "Norsk eller internasjonal? Norsk industri i Malaysia". In Nilssen, T. (Ed.), *Mot et bedre arbeidsliv*. Bergen: Fagbokforlaget.
- Lie, M. (2004). "Introduction: the changing geographies of China". In Hsieh C.-m. and Lu, M. (Eds.), *Changing China. A geographic appraisal*. Oxford: Westview Press.
- Malik, K. (2006). "Bridging development gap in today's China". Opening speech, *EU Roundtable FORUM Discussion*, Beijing 23 September 2006.
- One, A. (1996). "Anthropology, China and modernities: the geopolitics of cultural knowledge". In Moore, H. L. (Ed.), *The future of anthropological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